

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(征文选登)

电子邮箱：bjrbjchb@163.com

联系电话：3273243

好政策圆了我的梦

李志国

我出生在眉县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，家中兄弟三人，父母以务农为业，没有其他收入。小时候，生活非常艰难，常会为经济发愁，特别是每到开学的时候，经常要卖粮食来筹学杂费。家里的居住条件更是紧张，记得我上初中时全家五口人还都挤在一个炕上，那时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，让家里人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上学后，我发现自己身上承载着父母太多的希望，心想一定要考上大学，来实现梦想。经过努力，我考上了一所师范类院校，按当时的政策，不但不用交学费，每月还给一定的生活费，这对于家庭困难的我无疑是天大的好事，就这样，我顺利完成了三年学业，是党的好政策圆了我的大学梦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所

乡镇中学，当时是上世纪末，教师工资由各乡镇财政发放，而各乡镇经济不平衡，我所在的乡镇经济比较困难，拖欠教师工资现象严重，最长的时候有一年没有发工资。当时的住房条件也不理想，多是两个教师合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里。到了适婚年龄，我先后谈了几个女朋友，都因各方面原因而分手。

2000年前后，国家实行改革，出台了保障教师工资的好政策，我的收入状况有了很大改观，我也很快找到了另一半。婚后，我们就租房住，两人的收入除了维持日常开销外，其余很大一部分用于交房租。而生活是现实的，我和妻子免不了为琐碎的事情而争吵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妻子住在我们的房子里，于是我

开始盘算无论如何也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近年来，教师待遇不断提高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给了我很大帮助，只要缴纳住房公积金，就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，而且利息比商业贷款低不少。欣喜若狂的我，利用双休日很快选定了一套11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房子，随后申办了住房公积金贷款。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准，我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，想到马上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圆自己的住房梦，我当时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了。

一年后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温馨和自主，这才是自己的感觉。如今居住的小区，绿意盎然、环境优美。每次踏进新房我就想起：是党的好政策圆了我的住房梦。

“毓镇至东洼村客运班线今天正式通车！”这是2018年7月1日，发生在我家乡宝鸡高新区钓渭镇东洼村这个较为偏僻的小村子的事。这是可以载入我们村史册的大事，成为上一辈人想都不敢想、我们这一代人梦想成真的大喜事。

这天的天空格外蓝，乡亲们会聚到村文化广场，欢天喜地地参加毓镇至东洼村客运班线通车仪式，大伙儿围着挂着彩绸排列整齐的8辆中巴客车，扭着秧歌、敲锣打鼓，欢庆这一时刻的到来。

东洼村位于宝鸡高新区东南角，沿310国道高新区最东段南行4公里处，是个只有1000多人的半山区小村庄，地理位置偏僻，出门就得爬坡过沟，出行极为不便。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，小时候，家乡通往外边的道路是顺着沟道修成的，道路宽的地方两辆架子车相向可以勉强

通过，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架子车。道路有几段陡坡，拉架子车上坡时，一个人赶着牛在前边拽，一个人驾着车用力拉，后边一个人使劲推，才能拉上来。下坡时一个人在前边驾辕，一个人在后边踩着后闸慢慢下坡。坡陡路窄还有好多拐弯处，稍有不慎就会翻车。上了年纪的人说：拉一大车东西进出村，经常把心在手里攥着呢。去20多里外的高店赶集，背着背篋步行，往往得花一天时间才能赶回来。

最难行走的是连阴雨的日，路上满是泥，甭说拿东西，就是空手行走都很困难。我们上学时就身披塑料纸当雨衣，将裤管挽起，手里拄一根木棍，赤着脚在泥路行走，常常带一身泥水回家。大人们都穿着“泥

梯”走路。“泥梯”是用结实的木头做成的，上面是一块如成人鞋底大小的木板，木板四角各绑四根硬木腿，状如小木凳。下雨时，人们穿上布鞋，将小木凳系牢在布鞋上，可以在泥路上行走，我们叫它“泥梯”。爷爷见我们赤着脚走路，就提着“泥梯”说：“还是我这个‘泥梯’好，脚上不沾泥，走路还防滑，天晴了还能当小凳子坐。”

姚伟

爷爷一辈子没有坐过汽车，不知道柏油马路是什么样子，大婶也一生没有见过火车。我带儿子去外地回来，儿子说坐的火车很长很长，“呜呜”响。大婶听了露出羡慕而遗憾的神情，对我母亲说，她多想坐一回火车。大婶直到去世，也没有进过城，更没有见过火车。交通不便，不仅阻碍了乡亲们的出行，更主要的是阻碍了发展。1977年，公社组织全社社员在通往我们村子的沟口修建了一座幸福沟水库，通往

我们村的道路1978年改建，从水库坝上通过，再也不从沟底走了。新建的道路有5米宽，路基用料姜石铺垫，路面铺上砂石，路不仅宽广平缓，也改成了直道。2004年，村上争取到修建通村公路资金，将原来的砂石路建成水泥公路，几辈人出行难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。

我们村距310国道有4公里远，因为没有通村班车，需要步行一个小时或“打的”才能回村。今年4月，市运管处组织辖区高新运管所及有关客运企业负责人，对我们村进行了实地走访，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通车方案，于7月1日这天开通了通村客运班线。现在，不仅通村的路好了，还开通了客运班车，以后乡亲们再也不用为出行发愁了。

甘甜之水润心田

李拴伍

“狗娃，快给你伯倒水去。”母亲一看到我满头大汗，便对6岁的孙子狗娃急切地说。我还没坐稳，侄子便端来一杯水。“听说你要回来，妈就凉好了开水。”我“咕嘟咕嘟”三两下便把一杯水喝完了。

“妈，水咋这么甜呀？”“国家出钱在水塔上安装了净水器。”母亲高兴地说。近日回家，喝着这甘甜清爽的家乡水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那些绞水吃水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记事时，就听到小伙伴们喊叫：张家店没水吃，女人挑，娃娃抬，晃悠悠悠回家来，转眼一看剩半桶，挑上水担又排队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生于凤翔县城最北端的范家寨镇张家店村，紧靠千山山脉，村子是个“高海拔”的村庄，特别是我家住的一队，吃水非常困难，全队就一眼不知什么时候打的老井，简陋的井房内，不时传出“咯吱咯吱”绞水的声音和乡亲们的说话声。在乡亲们眼里，那口井的水是近200口人和几十头牲口

的生命之水。

那时，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井房，为家里挑水，去晚了就要排队等，最后去的绞上来的水就会浑浊。我是跟在父亲母亲水桶后长大的，母亲身材矮小，绞一桶水要费好大劲儿，她一只手握着轱辘把，一只手护着井绳防止绕偏，身体前倾，使劲绞才能把水从井底打上上来。挑水回家，母亲虽然坚强，但步履急促、晃悠不稳，一担水挑回家，总要洒出不少。我11岁的时候，便接过了母亲肩上的扁担，为家分忧。

井里常常会有“异物”，如掉到井底的木桶片，小孩子投进的小石头，井盖没盖好时，还会有到井台边寻水喝的一些动物。记得有一次，全村人都觉得水的味道不对，里面还有细小的短毛发，后来，住得距井房最近的李婶找不到小猪时，大家才“恍然大悟”。这下，乡亲们犯难了，吃水怎么办？于是，家家男男女女跑到二队、三队去挑水。队长见这样不行，还会影响

生产，立即派人下井打捞，清理了一天的井水，最后往井里撒了几锹白灰。几天后，井房里又热闹了起来。

自来水真方便，龙头一开水就流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乡亲们吃上了自来水，但30多户人家，只有一个水龙头，虽然不从井里绞水了，但还是天天排队挑水。到冬季，每天早上要抱些麦草烧开结冰的水龙头，一个冬天要烧坏两三个水龙头。夏天用水量很大，经常会限水。

2008年，县上专门为我们一队、二队打了一口机井，水龙头接到了家家门前，还专门为我们住得高的20多户人家修了一座小水塔。2016年，全村饮用水管网升级改造，水龙头接进了厨房。前段时间，村上又给饮用水水塔增加净水设施，从此，甘甜之水流进了家家户户，滋养着这个“高海拔”村子里的乡亲们。

美丽乡村建设让乡亲们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日子越过越幸福。村中的那口老井和排队挑水的队伍，成了人们心中的记忆。

我眼中的农村校园

杨海炜

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工作在农村学校，目睹了40年来农村教育的变化，每一个时期，教育的发展总能牵动千家万户。

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，当时学校还是七年一贯制，村村办初中，随着生源逐年减少，按照集中办初中的要求，我们村校腾出了两间房子作为学前班教室。当时试行三段上学制，没有闹钟，天黑乎乎的，爷爷就叫我和哥哥起来上学，我背着家里的板凳和用旧衣服缝制的书包，左右各挎一个，蹦蹦跳跳跑向学校。那时候，虽然赤着脚踩着泥、披着塑料纸、戴着破草帽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上学，但是总觉得能去上学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呀！

随着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，我们可以趴在桌子上写字了，坐着长条凳子，教室也通电了，虽然窗户用塑料纸遮风挡雨，但是寒风还会打着旋儿吹进教室，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不让一日闲过。书包由原来装两本书一支铅笔到慢慢增加，除课本外，小人书在伙伴中间传播，我们开始兴奋起来——可以打发业余时间了，了

解到更多的知识。学校机制的变化，由五年制变成六年制，为防止断档，我们还在四年级重读了一年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骑着自行车，终于可以去镇上读初中了，尽管路程长达10里，但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寒冬酷暑三年来从没耽搁一节课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坐在二层教学楼里上学，黑白课本也变成了彩色的，一个年级至少有五个班；第一次碰到了英语，第一次见到了香蕉，最为搞笑的是用汉字注解了“不拿拿”，席老师让我们默写“香蕉”二字，全班基本没人会写，更别提吃过了。早起晚归，一年复一年，我以全年级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了凤翔师范。一个农村娃从农村走向县城，见到了偌大的校门，校园全部水泥化，还有喷泉、四层教学楼、餐厅、图书馆……

近年来，农村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漂亮的教学楼让孩子们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，上体育课也告别了过去的土操场，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，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。

回忆“传呼”

魏亚岐

去年底，在收拾因搬家而搁置的旧家具时，我无意间翻到了一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年的老物件——传呼机，俗称BP机。眼着旧物，忆起往事，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“嘀嘀、嘀嘀”的传呼声，思绪又退回到“有事call我”的那个时代。

1994年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当时因为没有积蓄，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四百元，听见别人传呼机的“嘀嘀”声很羡慕，拥有一台传呼机简直就是奢望。直至1996年底，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将换下来的一台旧的摩托罗拉牌传呼机送给了我。不足巴掌大小的传呼机挂在腰间，感觉自己仿佛跨入了被羡慕的行列，碰见熟人、朋友就告诉他们传呼号，总是邀请别人呼我。

那时，我因为传呼机带来的一些无奈的事情，现在想起来也

会忍俊不禁。当时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，接到传呼常常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，跑到距家200米外的公用电话亭或街道对面自来水公司门前的IP电话机前回电话。有一次，刚吃过晚饭，传呼机突然响起，我急忙跑到IP电话机前，一摸忘记带电话卡了，只好又转身赶往电话亭，拿起电话打过去，刚说了两句：“谁呀？啥事呼我？”就听电话那头一个女子没好气地呵斥道：“还不回家，跑哪去了？”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想，怎么又是一个呼错号码的？

2002年10月，我进入新闻宣传单位，此时国内大城市的无线电寻呼业务已经停止，中小城市已近尾声，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，我也因为工作原因拥有了一部小灵通而“怠慢”了传呼机，取出那节7号电池，眷恋地

把它放在了抽屉的最里边。

不经意间，传呼机已经淡出人们视野很多年了。一个传呼的时代，成了永远的怀念和回忆。今天，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传呼机是个什么物品，倒是不断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成为人们的新宠。我的抽屉里，还放着好几部一充上电就能使用的旧手机。

前段时间，与一位曾在西安搞过古玩收藏的朋友闲聊，他说，一些最早流行的品牌传呼机现在也成了对一些收藏家的新宠。本以为只有古董字画才够得上，没想到一台过了时、连信号台都找不到的BP机，现在竟成了一种收藏品。“潇洒的你在哪里，寂寞的我在等你”“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回个电话行不行”……这些当年传呼机上“出镜率”最高的顺口溜，确实能勾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许多回忆。